

辛亥革命簡史

方志欽

广东人民出版社

K258/4

辛亥革命简史

方志钦

DA99b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7543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767543

辛亥革命簡史

方志欽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25印张 124,000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书号 11111·54 定价 0.43元

02-7727

目 录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
二、从孙中山开始·····	10
三、同盟会成立前后·····	26
四、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	43
五、此伏彼起的武装起义·····	62
六、保路风潮·····	81
七、武昌起义和武汉之战·····	96
八、连锁般的各省响应·····	114
九、早夭的南京临时政府·····	133
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	152
十一、历史的启示·····	169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被帝国主义强盗瓜分殆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正在日益加剧。从1840年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随时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新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腐朽的清朝。次年，日本把屈辱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根据条约，日本割去中国的领土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勒索二万万两的赔款，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特权。《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略转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分割领土或划分势力范围和以日益增多的资本输出为特征的。

甲午战争后，清朝的腐朽虚弱的本质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列强乘机争相向中国掠夺。沙俄帝国主义早已夺去了中国东北、西北边境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它贪得无厌，梦想把它的帝国扩张到长城脚下。日本割去了辽东半岛，对沙俄的南下扩张计划大为不利，因此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以收取中国三千万两银子赎金的代价，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俄日对中国东北的争夺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在中国的表现。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险恶。在北

方，沙俄的侵略势力渗入到东北三省和新疆。它租借了旅顺、大连，把持了东北出入海的门户；取得了新疆全省的金矿开采权和贯穿东北三省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同意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沿路地区铁路修筑权让与别国。实际上，中国东北、西北广大地区，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在南方各省和东部、南部沿海，由于英、法、德、日等国争相伸手，形势更为复杂。英、法先后侵占了云南边境的一些中国领土。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英国租借了九龙半岛，与早已被占领的香港连成一片。中国南方出入海的两大门户分属英、法控制。法国先后取得云南、广东、广西的开矿优先权，四川灌县、犍为等地的煤矿开采权，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得到了清政府不把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让与别国的保证。英国取得四川全省的矿产开采权，南京至上海、苏州和杭州至宁波等铁路修筑权，强迫清政府宣布长江沿岸各省和广东、云南不让与别国。长江流域成了英国势力范围。华南、西南各省成了英、法的势力范围。德国租借了胶州湾，取得了山东省大部分铁路修筑权，把山东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日本割取台湾后，迫使清政府声明福建省不让与他国，把福建变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还租借了威海卫，把它的势力楔入山东；攫取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的矿产开采权，把势力楔入黄河流域；夺得奉天中后所至新民屯的铁路修筑权，把势力渗入东北。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新兴帝国主义美国，早些时候因忙于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和关岛，所以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棋差一着，抢不到一块地盘，捞不到一点特权。但它不甘心全部赃物落入别国的手中，因此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帝国主义强国分别控制下的中国各门户向美国开放。这是在承认列强在中国既得的侵略利

益的前提下，要求“均霑”一份赃物的政策。这一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得到其他各国的同意。各国还互相承认彼此的势力范围。这是列强在激烈的争夺之后的暂时妥协。这一妥协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作交易的。妥协只是暂时的。一场新的争夺正在酝酿着。只要一有机会，列强又会象一群饿狼一样再次扑向中国。

边缘被蚕食得残缺不全，中间仅仅保持着形式上的整体，而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一片干枯的桑叶，这就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地图。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的资本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输向中国的主要形式是附有各种苛刻的政治条件的贷款。清政府为了支付甲午战费和对日赔款，从1894至1898年，先后向英、俄、法、德四国借款七次，总共约银元六亿四千万，都是以关税或盐税、厘金作抵押。贷款按九八折或九八折以下支付，最低的竟达八三折，年息从四厘至七厘不等^①。通过这种高利贷，帝国主义从中国攫取了诸如关税等更多的主权和巨额的厚利。

资本输出的另一种形式是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和修筑铁路。1895年以前，英、德、日、俄、美等五国开设的工厂，共有107家，1896至1902年增至136家，到1913年更增至358家^②。最后的数目比1895年以前增加2.3倍有余。帝国主义各国还纷纷投资于各种矿业。1898至1902年，英国在华矿业资本额达八千万两（银）^③。1902年法国对华矿山投资达五百万法郎^④。其他国家也有大量的投资。1895年6月至1898

① 见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

② 作者据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有关数字汇计。

③④ 据同上书原有数字。

年11月，各国夺去中国将近一万九千里的铁路修筑权^①，也意味着相应的巨额铁路投资。对华工业方面的资本输出，使垄断资本获得了高额的利润。据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的统计，其利润率高达22.9%（1896—1902）和22.2%（1903—1913）^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③。可见外国资本对中国工人的榨取远远超过对本国工人的榨取。

由于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银行在中国纷纷增加，除原有的英、德、日银行外，从1895至1901年，又陆续增设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华银行、英国有利银行等。

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工厂、矿山、银行和修筑的铁路，就象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管，大量地吸取膏血。这一切，连同数目惊人的对日赔款等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落在饱尝封建剥削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

随着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各种特权的取得，帝国主义势力日益深入到中国的腹地。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使全国人民都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足迹遍及各地城乡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传教士，更是无恶不作。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占田夺产，鱼肉人民，为害甚大。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

清政府在甲午之战中败给日本这个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丧师辱国，割地赔款，说明了它只有投降卖国的本事。

① 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

② 据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原有数字。

③ 据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而绝无保国御敌的能力。再经1900年对八国联军之战，它就完全被帝国主义制伏了，成了百分之一的帝国主义走狗。但是，清政府对内却如狼似虎，变本加厉地实行高压统治。它既不容许人民有丝毫的言论、行动自由，更反对任何进步的变革，尤其严禁革命运动。它经常把革命人民诬为盗匪，成批成批地剿杀。“街衢往来，不得并肩，市廛交易，不得高语。踽踽而行，眈眈而视，满城凄然，森如地狱。”^①这就是清朝反动统治造成的政治局面。

清朝政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也随着赔洋款、借外债而日益加重。征粮方面，除正粮之外，又有所谓津贴、捐输、新捐等名目，使新征收的数量为正粮的五、六倍。抽税的名目也越来越多，有所谓百货厘、牙税、盐税，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要抽粪税。还有各种捐，如房捐、票捐、屠捐、烟捐。还有各种兵饷和随时需索的款项。此外，还随意强迫摊派民伏服各种无偿劳役。清朝各级官吏，都善于贪污搜刮，靠人民的血汗自肥。早已被高额地租和高利贷榨尽脂膏的农民，哪里再经得起敲骨吸髓！他们无时不在饥饿线上挣扎。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完粮纳税，迫得卖妻鬻子，家破人亡。

尽管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国亡无日，清朝统治者却依然是歌舞升平，荒淫无耻。慈禧太后那拉氏，从1895至1900年，大兴土木，续修颐和园，每年耗银三百多万两；预建她的陵墓，每年耗银一百多万两；修天津行宫，提取昭信股票余款六百多万两。其他王公亲贵、达官显宦，也照样醉生梦死，享乐腐化。清朝政府已成为国家的赘疣。

清朝统治者感到，他们已置身在行将爆发的人民革命的

① 望帝：《四川讨满洲檄》，《天讨》。

火山口上。他们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只有卖国到底，做帝国主义者卵翼下的儿皇帝。“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百业凋零，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民族工商业也受到巨大的压抑，不能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受到严重束缚。冲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网罗，打破腐朽反动的上层建筑的牢笼，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这两对矛盾发展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变得非常激烈、尖锐。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都痛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也痛感到清朝政治的腐败，要奋起救国。这两对矛盾交织在一起，使阶级斗争变得复杂起来。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两对矛盾，是摆在当时中国各阶层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又一次激起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巨浪。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群众自发的反帝暴力行动，在全国各地此伏彼起。反教会斗争仍然是这个时期反帝斗争的普遍形式。1895至1897年，群众捣毁教堂、杀死横行不法的外国教士的反教会斗争，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山东、贵州等省数十个州县；1897年以后，反教会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各省。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1899年广东人民反对英国租借九龙半岛和法国租借广州湾，四川大足县农民起义，都发展为颇具规模的武装反帝斗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下同）第594页。

争。1895年台湾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使日本侵略军付出作战近半年、伤亡三万余人的巨大代价。直隶、湖北、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省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主要表现为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不少地方还发生武装暴动，而以1895年甘肃、青海回民暴动声势最为浩大，参加者有数十万人之多。1898年广西陆川县会党起义，一度发展到十几万人；安徽涡阳等县的农民暴动，有数万人参加，声势也不小。上述的群众斗争表明，斗争的主要锋芒虽然越来越集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方面，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也丝毫没有减弱。甲午战争之后，从全国范围来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到首要地位。但是在某些局部地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居首要位置。总的来说，人民大众反对清朝统治，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同时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打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所以客观上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由此可见，反帝反封建的两大革命任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1898年开始到1900年形成高潮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是中国农民自发反帝斗争的总汇。中国农民高举反帝的“灭洋”旗帜，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和河南等省，燃遍了反帝斗争的怒火。北京、天津更是在义和团掌握之中，使朝野震撼，侵略者丧胆。英、德、日、俄、美、法、奥、意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悍然组成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虽然在中外反动派内外夹击下失败了，但是它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狠狠地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他们有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抗击任何侵略的伟大潜力。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被粉碎了。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坚决的，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因此在斗争中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他们也对清朝政府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灭洋”的同时提出“扶清”的口号，合起来就是“扶清灭洋”，把封建主义的代表清朝政府错当成朋友，结果受骗上当，被“洋”和“清”两股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

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屡起屡败说明，他们不可能承担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就在农民群众持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候，有两股新的势力崛起于政治舞台，与农民革命力量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一股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一股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两个派别都看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都要救亡图存，都要向西方学习，实行变革，但是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改良派的政治活动比革命派开始得早一些。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1898年的“百日维新”，使这个运动达到高潮。改良派幻想在不触动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的前提下，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变革，但是反动的封建势力却不容许他们这样做。所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把这个运动镇压了下去，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改良派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清醒过来。就在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的1900年，不甘失败的改良派，又组织“自立军”，打出“讨贼勤王”的旗号，企图一举打垮义和团和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让光绪帝重新执政。但是“自立军”还没有来得及起事就被镇压下去了。“自立军”的失败，使很多人逐渐觉醒，从改良主义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转向革命。但是，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仍坚持改良主义的错误，并逐渐走向反面，成为保皇派，与顺应历史潮流而起的革命派为敌。

比改良派后起的革命派，提出了以武力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从戊戌变法和“自立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在义和团和“自立军”起事的1900年，革命派在广东惠州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与“自立军”的“勤王”宗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革命派对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也抱着错误的态度。他们污蔑义和团是“奸民”和“匪”，甚至认为“平匪全交（镇压义和团，保全与帝国主义的邦交）乃为至理”^①。这种颠倒敌友的错误观点，来源于革命派对群众自发斗争的错误认识和对社会矛盾的错误估计。他们认为，群众的自发斗争会妨碍他们的革命秩序，又认为，革命斗争的锋芒只应对准清朝统治，而不对准帝国主义侵略者，甚至幻想帝国主义支持他们的反清斗争。这种错误的认识和估计，使革命派不可能很好地团结农民这支同盟军，也不可能提出反帝的口号。但是，革命派在南方的反清斗争和义和团在北方的反帝斗争，客观上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他们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当八国联军的炮声沉寂下来的时候，清朝政府已经跪倒在帝国主义者们的脚下，完全成为他们的走狗。于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锋芒就集中指向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身上。从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

二、从孙中山开始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①。“从孙中山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

辛亥革命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是孙中山。孙中山原名文，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就参加农业劳动，“早知稼穡之艰难”^③。喜欢听讲太平天国故事，对洪秀全十分向往。十岁至十二岁（1876—1878年）在村塾读书。十三岁至十六岁（1879—1882年）在檀香山读书，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逐步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④的愿望。十七岁至二十五岁（1883—1891年）先后在香港、广州读中学和学习西医。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过中法战争（1883—1885年）。中国的战败，给孙中山的思想以很大的震动，使他产生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思想萌芽。1889年，他写信给退职的洋务派官僚

①②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27、528页。

③ 孙中山：《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函札。

④ 孙中山：《非学问无以建设》，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演讲。

郑藻如，主张效法西方，实行改良，提出兴农桑业、禁绝鸦片、普及教育三点建议。1890年前后，常来往于香港、澳门之间，发表反清言论，又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抨击清朝统治，被人称为“四大寇”。二十六岁（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从此结束了他的“以学堂为鼓吹之地”^①的革命思想萌芽阶段。1892至1893年，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②，开始进行实际的革命探索。1893年，曾经和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广州商议建立兴中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立会的宗旨，但没有正式建立组织^③。又与郑士良等进行联络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和交结官绅的活动，以积蓄力量。1894年6月，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发展工农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国家富强。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④这四件事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孙中山希望李鸿章等清朝统治者采纳他的意见，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但是李鸿章不予理睬。

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引起孙中山思想的大变动。上书以前，虽然他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但还有“改良祖国”的幻想和“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或一奋起”^⑤的侥幸心理。这说明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倾向虽是革命的，但同时也有改良主义的杂质。上书失败后，他在“怆然长叹”之余，猛然省悟到和平的手段不可能救中国，于是毅然决然与改良主义思

①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

④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卷。

⑤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

想决裂，决心走革命的道路。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使孙中山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大声疾呼，要革命救国。1894年10月，孙中山离国经日本到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革命，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在有二十多名革命华侨参加的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章程痛斥了清朝统治者“因循苟且，粉饰虚张”，“辱国丧师”，“荼毒苍生”的腐朽与反动，指出了“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险恶形势，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任务^①。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这十四个字，成了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初的纲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兴中会章程和誓词都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显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这说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足。但是兴中会实际上也有反帝的要求，它的章程就提到要从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中，“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③。兴中会的反清，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客观上也是反对帝国主义。1895年1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分会。2月，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机关，以“乾亨行”的名义作为掩护；又在广州设立分会，以“农学会”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团

① 孙中山：《兴中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

③ 孙中山：《兴中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

体在中国的首次出现，也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开始。

兴中会之所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因为它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又因为它的宣言提出的“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兴大利以厚民生”^①，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反映。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1895年以前，民族资本开办的工厂共有十七家，资本总额约七百二十九万元。^②1900年以前，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有一百二十二家，资本总额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③一万元以下的企业还未包括在内。这些数字说明，民族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一些地位，但力量还很软弱。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也很软弱，这是它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它深受压抑和排挤，所以迫切要求排除阻力，迅速向前发展。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产生的根源。但是民族资本主义一开始发生，就对帝国主义有严重的依赖性，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资产阶级妥协性产生的根源。“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

① 孙中山：《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

② 见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③ 见吴玉章：《论辛亥革命》。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33页。